

★ 荧屏内外**记录空战功臣热血传奇**

■ 余海玉

近日,央视国防军事频道《时光军史馆》栏目推出“击落敌机传奇”系列专题片,将镜头对准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国防空战中的空战英雄。创作团队抢救式采访10余位年逾90岁的空战功臣,记录了大量具有史料价值的口述影像,生动再现了航空兵部队以弱胜强、击落敌机的峥嵘岁月。

这是一次与历史的深情对话,也是一次对精神的深刻追寻。创作团队历时数月,足迹遍及多地,记录下每一帧影像、每一段讲述,都承载着厚重的历史记忆,弥足珍贵。

时光流逝,壮士暮年,但镌刻在灵魂深处的军人本色与报国信念从未褪去。在湖南怀化,创作团队见到了93岁的老兵朱以隆。老人腿脚不便,白天大部分时间都坐在轮椅上,却谢绝搀扶,坚持独立完成起身、落座。那份刻在骨子里的坚韧,仍体现在老人生活的细节中。

“我飞得过高,拉得过硬,结果一下就进入螺旋状态了,两台发动机就停了。”当朱以隆手握歼-6战机模型,讲述1965年击落敌机后从万米高空坠下、最终艰难化险为夷的战斗往事时,目光如炬,情绪激昂。随着这位空战功臣的深情讲述,创作团队愈发读懂当年战斗的艰险不易,也真切触摸到先辈们誓死捍卫祖国领空的赤胆忠心与铁血精神。

在上海,创作团队寻访到1967年4月24日那场空战的3位关键人物——指挥员车香友、领航员张凤林和飞行员宋义民。当时,面对美军顶尖的超音速战机,他们毫无惧色。在他们的密切协同下,编队飞行员驾驶无导弹装备的亚音速歼-5战机,凭借贴身近战的灵活战术,让敌方导弹无从发挥。最终,他们利用航炮一举击落敌机,创造了协同配合的空战典范。

一场惊心动魄的空战,在老兵们的口述中变得清晰立体。结合军史专家的深度解读,创作团队更加深刻认识到,面对装备优势明显的强敌,每一场胜利的背后,都是无数蓝天卫士以命相搏、向死而生的无畏抉择。

96岁高龄的车香友动情地说:“武器装备不是绝对因素,人才是,一定不能怕死。”这是一代代蓝天卫士用青春、热血乃至生命践行的誓言。

对红色历史的忠实记录,是为了将鲜活的记忆转化为永恒的传承。创作团队怀着强烈的历史责任感与深沉的敬意,一路寻访,也一路受教育。

曾被国防部授予“战斗英雄”荣誉称号的舒积成老人,如今已是93岁高龄。老人带着浓重的重庆口音,细数三战三捷的战斗经历,并回溯童年目睹日军战机轰炸家园时立下的誓言:“一定要当飞行员,消灭敌人。”

创作团队把对英雄的崇敬融入节目制作,反复打磨叙事结构,将个人成长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,让英雄足迹更加清晰动人。节目播出时,舒老的老部队组织集体收看,很多年轻官兵给舒老发送信息,表达坚定履行使命的决心。舒老看到后深受感动。人生已到暮年,他们关注的依然是那一片天空,始终期盼着新时代官兵赓续优良传统,守护好祖国的蓝天。

创作团队的采访拍摄已持续3个多月。让他们倍感欣慰的是,此行及时记录了一等功臣高翔最后的珍贵影像。

1965年,高翔与美军飞行员史密斯在空中展开殊死较量。为确保仅有的航炮能击落敌先进战机,他冒险低空攻击,距离74米时命中目标,脱离时两机距离仅39米。这一超近距离搏杀,创下了世界空战史的纪录。

2025年,创作团队赶赴辽宁盖州寻访高翔时,老人已身患严重的阿尔茨海默病,甚至记不清亲人的姓名。他的女儿告诉创作团队,在记忆快速退化的情况下,老人多次梦中惊醒,喊着要去机场起飞迎敌。创作团队对此深受触动,用心记录下老人的生活画面。2026年1月4日,系列专题片第一集播出高翔的英雄事迹,许多网友留言表达对老人的崇敬和关心。仅过了5天,高老就与世长辞。专题片中的珍贵记录,成为告慰英魂、永载史册的深情纪念。

一段段口述历史,揭开的是尘封的档案,激活的是奔流的热血。从朱以隆的绝境救机,到高翔的惊天一击,无不将“空中拼刺刀”的战斗精神展现得淋漓尽致。

创作团队的寻访之路仍在继续。他们深知,每一次记录,都是打捞即将远去的历史细节;每一次定格,都是擦亮民族精神的不朽丰碑。这些英雄的事迹正激励着新时代官兵,像先辈一样不畏强敌、果断亮剑,在万里长空续写新的荣光与传奇。



扫码观看“击落敌机传奇”系列专题片

下图:“击落敌机传奇”系列专题片海报。作者供图



空战功臣口述
解码以弱胜强传奇

国防空战系列专题片

击落敌机传奇

央视国防军事频道
《时光军史馆》栏目
持续推出 敬请收看

守住军人的“根” 追求艺术的“真”

■ 本报记者 奉云鹤

★ 人物专访

记者:您的文艺生涯起点是在什么时候?

张勇手:我14岁就当兵了。那年,解放军第18兵团入驻我的家乡,穷苦人终于迎来了解放。解放军进城时,唱着嘹亮的歌——《解放区的天》《八路军进行曲》,听得我心潮澎湃。当时,我就对参军充满了向往。过了一段时间,我报考了晋中中学。入学后,我才知道这是18兵团的随营学校,自己已然成为一名真正的解放军战士。那天是1948年11月1日。

进入1949年,我逐渐适应了部队的生活,表现比较活跃,入伍拉歌时还经常指挥打拍子。正逢18兵团60军、61军、62军文工团来招人,我就被60军文工团选上了。我的文艺生涯就算是开始了。

从小在母亲的教育下,我很崇拜唐代郭子仪、宋代狄青等英雄,幻想着自己有朝一日能骑马跨枪走天下,谁知却阴差阳错地进了文工团唱歌跳舞。虽然这与我入伍时想的不太一样,但我知道军人要以服从命令为天职,党叫干啥就干啥,因此也没多想。

到文工团的第一天,我正好赶上他们排演歌剧《白毛女》第一场,看得我痛哭流涕,想起了我残疾的母亲和早逝的父亲,想起了自己当兵时遭受的欺凌。我暗下决心,一定要提高觉悟,奋勇杀敌,浑身充满了力量。从这个事上,我切身体会到文艺工作鼓舞人民、教育人民的重要作用,一下子就把我的思想武装起来了。

记者:您在抗美援朝战场上荣立两次三等功,其中一次是因为战时慰问方面表现突出,可否讲讲这些故事?

张勇手:其实这里有一个插曲,立功之前,我先是挨了批评。我第一次和战友去慰问部队时,别人都跑了好多山头 and 阵地,而我老是蹲在一个阵地上坚持着,就想趁参加一次战斗。此前,我赶上了解放战争的尾巴,1951年听说部队要入朝作战,别提心里有多兴奋。部队要求战士写保证书,并留下家庭地址、姓名等信息,立功了或牺牲了,都会通过这个地址告知家里。大家并不觉得这有什么异样,满心想着为祖国杀敌立功,这是当年每个战士的心愿。

受到批评后,我才转变了观念。第二次到前线慰问时,我就拼命到处跑,冒着随时有可能挨炸弹的风险,深入前沿阵地,有时候晚上也不休息。慰问前,我会事先了解战士的先进事迹,将其编成快板和歌曲,随后找到本人一对一表演。志愿军战士有时隐藏在猫耳洞,空间很狭小,我就跪着表演,还为他们送朵花。这样的战地慰问很鼓舞士气,就这样我打了一场翻身仗,立了三等功。

记者:从抗美援朝战场回来后,什么样的契机让您和电影结下了缘分?

张勇手:1956年,八一厂因拍摄电影《柳堡的故事》,来60军文工团选演员,让我和一位女同志表演一个小品,就是二妹子和副班长的一段情节,拍了一些照片就走了。我并没有当回事,很快就忘了。没想到,过了一段时间八一厂寄来一本厚厚的剧本,叫《最后一个冬天》,就是后来的《黑山阻击战》,让我看一下剧本里的连长王海龙。那时,我只看过两部电影,可以说对电影一窍不通,以为拍电影平时唱歌跳舞差不多。我就以懵懵懂懂的状态去八一厂试镜,在那里遇到了自己的第一位伯乐——刘沛然导演。

刘导是1938年参加抗战的老革命。他在1952年上映的《南征北战》



3月2日,张勇手接受记者采访时留影。

奉云鹤摄

中演过“张连长”,是银幕上最早有影响力的连长形象。《黑山阻击战》是他独立导演的第一部故事片。因亲历这场战役,他拥有深厚的生活积淀。

我到八一厂后,电影剧本改了很多次。“王海龙”从主角变成了配角,在演员表名列第九。但当时我们没有主角配角的观念,做任何工作都是革命工作,都是为了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。那段时间,我真正体会到电影创作的不易。拍摄条件很艰苦,胶片尤其宝贵,拍一个大场面往往需要3天时间,第一天排练,第二天准备,第三天才正式拍摄。胶片的稀缺,也促进我们更加刻苦训练。

片子陆续拍了1年多,之后我回到了文工团,以为这算完成了任务,不会再回去拍电影。刚回来没多久,我又接到再去八一厂补拍镜头的通知,结果补拍方案还没确定,就接到另一部电影的拍摄任务,片名为《英雄虎胆》。就此,我遇到了人生第二位伯乐——严寄洲导演。他同样是老革命,1938年赴延安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并入党,期间创作过很多部话剧。严导在艺术创作中以“三严”著称,即选演员严、对自己严、艺术创作要求严。

后来,我跟着刘导又拍了《林海雪原》,跟着严导拍了《哥俩好》《海鹰》《二泉映月》,就此与电影结下了不解之缘。两位恩师身上的那种朴素与认真的品质,深深影响了我后续的电影创作。

记者:您提到的这些电影在当时几乎家喻户晓。此外,您还参演过《奇袭》《地道战》《南征北战》《啊!摇篮》等作品,成为一代人的光影记忆。当演员期间哪些事情让您印象深刻?

张勇手:拍《奇袭》的时候,有一个跳车的场景很惊险。电影中,我扮演的连长方勇开车把后面追来的敌人引到悬崖边,在离悬崖很近的地方跳车,车随即掉下悬崖。我之所以能一次性完成这个动作,得益于此前的跳伞训练。

拍《奇袭》前,我接了一部反映伞兵生活的电影《碧空雄师》。主要演员每天要训练,从1米到9米高的台子上不停地跳下去又爬上来,适应高空落地时的冲击力,还把伞兵部队所有训练内容都学了一遍。我刚学会跳伞技能,就被抽调到《奇袭》剧组,没想到跳伞技能最终用在这部电影的拍摄上。跳伞的要领是双腿并拢落地,就不会受伤,跳车的时候我就牢记了这一点。我很感谢学跳伞的那段经历,与跳伞相比,跳车容易得多。

此前拍摄《海鹰》时也有惊险一

幕。我扮演的水手李雄,要抛掷快艇上的烟幕弹。烟幕弹很宝贵,我没有实弹训练的机会,只看了水兵的几次动作示范,就开拍了。快艇在海上疾驰,像骑马一样又快又颠。人在甲板上容易掉进海里,若掉到螺旋桨处,更是有去无回。好在整个过程比较顺利,也是一次性完成了拍摄任务。那时没有替身一说,演员既要胆大心细,也要精通十八般武艺。

记者:您后来转型为导演,和过去当演员相比,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?

张勇手:第一次站在镜头后边喊“预备,开始”的时候,我的心不由自主地怦怦跳,一时间很不适应。演员只要完成我这个角色就可以了,导演则不然,要把握影片的全局,要找到每个角色的重点,找不到这个,就立不住。我边拍边琢磨,想起跟随刘导、严导拍电影的经历,逐渐适应了这个新角色。

我曾给一个期刊写过一篇文章,其中的主要思想是“真听、真看、真面对”,这也是我数十年电影生涯始终坚守的原则。无论是演员还是导演,我认为都要守住军人的“根”,追求艺术的“真”。

熟悉我的人都知道,我是一个很较真的人。拍《黑山阻击战》的时候,我就跟刘导有过争执。其中一个情节是这样的:国民党押解一群老百姓当人质打前锋,原剧本写的是老百姓在喊:“我们是老百姓啊!”我听后总感觉哪里不对劲,认为老百姓不会这么喊,应该是坚持不喊,不让敌人的阴谋得逞,事实也确实如此。因为这件事,我这个电影新人从办公室到宿舍追着刘导提意见,回过头痛想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。刘导没有生气,他的心胸很宽广,最后也采纳了我的建议。

我执导过的电影,没有一部是轻松的。《南海风云》是在西沙拍的,吃住不方便,条件很艰苦,在那里拍摄了大概1年时间。《彩色的夜》中,有汽车运输队在抗美援朝战场上运输物资的剧情。敌人飞机过来了,通过防空哨收到信号后,运输车的车灯全部要关,而且不能停,还要慢慢地开。在没有灯的情况下,当时就出了很多事故,有的车都掉到沟里去了。《祁连山的回声》是在河西走廊拍的,西北的冬天非常寒冷,我们穿的是单衣,当年红军穿的就是单衣啊!《沉默的冰山》是在帕米尔高原拍的。我们去海拔接近6000米的地方拍摄,演员们嘴唇都是紫的。所有的场景,我们都是按照真实的情况去拍的,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打动人、感染人。

苦归苦,但想到那些战场上的战

士们、那些高原岛礁驻守的官兵,我不敢言苦。这些电影本身在教育着我们,拍戏的时候我们也是含着眼泪拍的。有一位老家在陕西的演员,也是一名军人。拍完《沉默的冰山》后,他复员了,但没有回家,而是留在了帕米尔高原。他说要在那里养牦牛,专门给哨所官兵送肉,让我很受触动。

记者:您演过很多不同类型的军人角色。您认为,成功塑造一个军人形象,会对部队官兵产生什么样的影响?

张勇手:我曾经在云南拍戏的时候,遇到一位军分区司令员。他见到我后特别激动地说:“我就是看过您演的《奇袭》当兵的。我想想方勇连长一样当个侦察兵,后来当上了,再后来还当上了侦察连连长,圆了自己的梦想。”通过这件事我更加确定,一部好的军事电影对社会青年、对部队官兵的影响是很大的。

记者:我看到您家里墙上挂着“兵魂”二字。这两个字对您有什么特殊意义?

张勇手:当演员时我想过,演军人要演什么形象?我觉得我要做的不是演得像,而是要把兵魂演活,要展现出他们的信仰、他们的忠诚,以及他们心怀人民的精神。我也从未忘记,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兵,即便离休了,依然是一个兵。很多人邀请我去商演、拍广告,我不去。我只参加公益活动,而且不要报酬。因为我知道,我来自人民军队,是一生要为人民服务的文艺工作者。

人民给了我很多荣光,但这份荣光不属于我,而是属于那些战斗英雄。我有幸在银幕上塑造了一些军人形象,表现了他们的忠勇,通过他们再现了光辉的历史。如果我作为演员身上有了些许光芒,这光芒也是借自那些真正的战斗英雄。

| 记者手记**永不褪色的兵魂**

■ 奉云鹤

采访之初,张勇手并未谈及自己的光影人生,近3个小时的长谈,有一半时间是在讲述少年时的参战经历。部队的番号、征战的地带、战斗的细节,他如数家珍。与漫长而绚烂的电影生涯相比,那段参战时光虽然短暂,但在他心里从未淡去。

张勇手珍藏着一张14岁入伍时的旧照。一身胖胖的土黄色棉军服,裹着尚未长开的少年身躯,腰间皮带勒得很紧——那还只是一个身披战袍的孩子。

少年从戎,肝胆许国;暮年白首,兵魂依旧。张勇手说,他最喜欢“兵魂”这两个字。在他看来,战场上那是冲锋的勇气,艺术中那是创作的信念。他在银幕上塑造过很多军人形象,每一个角色里,都藏着少年时成为战斗英雄的梦想,兵魂由此自然流露。虽未在硝烟中圆梦,他却以另一种方式走近英雄、诠释英雄、致敬英雄,也呼唤更多英雄。

我忽然懂得:于他而言,电影生涯的开始不是人生的转折,而是使命的延续——无论走到哪里,都尽着一个兵的责任。那永不褪色的兵魂,早已融入血脉,历经岁月洗礼,愈发璀璨夺目。

题图:张勇手演过的部分军人形象。

题图制作:许 硕